

唐太宗与昭陵



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

唐太宗与昭陵

一九八五年五月

昭陵 陸駿



唐太宗与昭陵

(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)

编辑者

人文杂志丛刊编委会

发行者

陕西省社科院出版发行室

(西安市小寨西路23号)

封面插页印刷

富平县印刷厂

内文印刷

陕西省社科院印刷厂

期刊登记: 129 号

定 价: 1.00 元

昭陵六骏 (石刻·宋代)



陕西师大历史研究所摄

昭陵（背面，从西北方向摄）



昭陵祭坛（从西方向摄）



李勣葬服“三梁进德冠”

本版摄影：张允明

李震墓出土“海兽葡萄镜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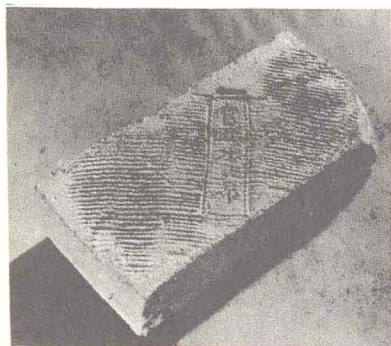


魏徵碑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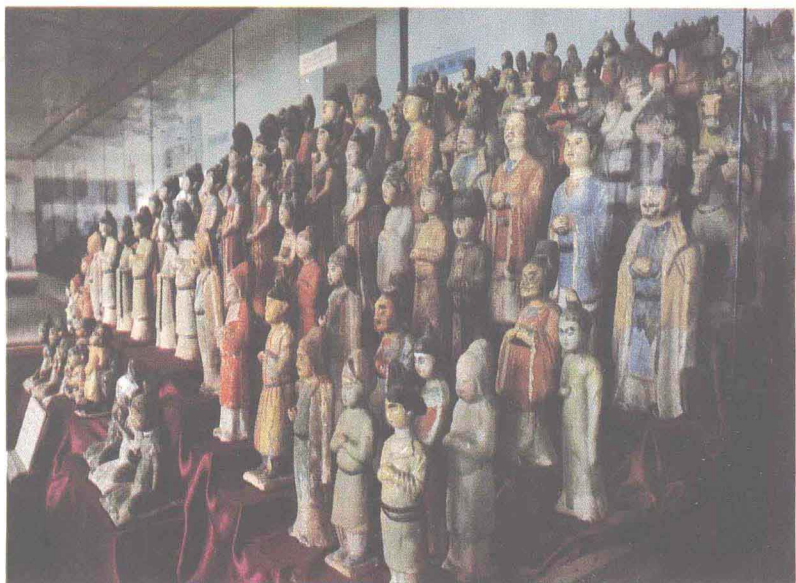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勣碑头

兽面瓦当
(昭陵祭坛出土)



“官匠李泉”字砖
(昭陵祭坛出土)



彩绘釉陶俑群（出土文物）

昭陵博物馆供稿



李劼墓

昭陵博物馆供稿

目 录

唐太宗的生平事业·····	胡 戟 (1)
百代英主 千古一帝	
——论唐太宗的历史地位·····	袁英光、王界云 (8)
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·····	吴宗国 (23)
唐太宗的开放政策及其历史作用·····	李文澜 (33)
唐太宗与蕃将·····	马 驰 (51)
唐太宗与史学·····	牛致功 (69)
略论唐帝陵的制度、规模及文物	
——兼谈昭陵“因山为陵”对唐帝	
陵制的影响·····	孙 迟 (82)
昭陵祭坛勘查整理后记·····	李 全、石 根 (108)
昭陵六骏史话·····	乙 木 (114)
历史不泯有心人	
——保护昭陵文物有功的几位古人·····	孙东位 (121)
封面设计·····	介 眉
封面题字·····	云 石
封二、封三：昭陵文物	
封底：昭陵六骏（宋代石刻）	

本辑责任编辑：张玉良、王增浦、黄伟

唐太宗的生平事业

· 胡 戟 ·

唐太宗李世民生于公元599年1月23日（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），童年少年时代经历了隋王朝由极盛而大乱的转折，青年时代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。

十六岁时，隋炀帝北巡，在雁门被突厥围攻，他从军勤王。事后随父亲李渊在太原。那时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已如火如荼，李渊任太原留守，手握重兵，威镇一方，许多人慫恿他反隋。李渊早有此志，但他是个老谋深算的官僚，吸取杨玄感失败的教训，不肯冒然行动。直到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先后攻占金堤关、兴洛仓，在洛阳牵制住隋军主力，农民战争发展到使隋炀帝政权首尾不能相顾时，才于公元617年（大业十三年）在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起兵。李世民在这段时间里非常活跃，结交豪杰，秘密组织力量，迫不及待地催促李渊动手。起兵后与长兄李建成分领左右军，击西河（今山西汾阳）、攻霍邑（今山西霍县）、徇渭北、占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，屡建战功。他率领的右军胜兵十三万，是兴唐的主力。

隋亡以后，群雄逐鹿，争战激烈。李渊坐镇国都长安，李建成以世子身份居中协助，领兵四出征战的事，更多地落在次子李世民肩上。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李世民在黄河流域负责指挥一系列重大战役，对唐政权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这是他颇以

为得意的“吾十有八举义兵，二十四定天下”的一段经历。

李世民负责指挥的第一次大战，是对薛举、薛仁杲父子的战争。薛举占据陇右，自称秦帝，兵进扶风（今陕西凤翔）、泾州（今甘肃泾川），构成李唐的心腹大患。武德元年（618年）七月初战，唐军大意轻敌，被秦军袭破大败，损兵折将十之六七。年末再战，李世民冷静坚守高墪城（今陕西长武）六十余天不出战，待秦军粮尽求战心切，才派出小部队引诱疲敌，随即自己率大军从敌后突击，秦军在夹攻下溃败，李世民马不停蹄，只带二千轻骑抢先赶到敌据点折墪（在今甘肃泾川东北），使溃退下来的敌兵不能入城，纷纷散去。待唐军大部队兵临城下时，薛仁杲计穷只好投降，取得全胜。事后李世民解释说：薛军都是陇外人，将骄卒悍，我们先只是出其不意打了胜仗，斩获不多，如果让他们退进城里重新组织起来就不好打了，所以必须赶在前面把败兵截在城外，这些兵一散回家，薛仁杲就无计可施了。显然他是认真地吸取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，这次战事成了作为军事家的李世民走向成熟的里程碑。在以后的战争中，他非常注重战场的实地调查，应用灵活多变的战术，在军事舞台上导演了许多出威武雄壮的活剧。

武德二年（619年）平刘武周的战争，李世民率军在晋西南与敌军相持五个月，不与决战，同时尽力策应坚守在浩州（今山西汾阳）的唐军，在敌后安下一个钉子，籍以阻断汾河东西敌军运粮的道路。这个策略获得成功，敌军被迫北撤，李世民抓住战机击敌之堕归，一昼夜追击二百余里，打数十仗。自己二日不食，三日不解甲，为士卒作出表率。被迫歼的敌军丧魂落魄，作鸟兽散，刘武周逃奔突厥被杀。唐军拓地至代北。

唐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后，便于武德三年（620年）集中兵力东进，与洛阳的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决战，他们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对手。出征军的统帅仍是李世民。

唐军这次是外线作战，不能旷日持久地等待战机，李世民就采取直逼洛阳合围攻坚的战法，经过八个月的鏖战，眼看困在洛阳城中的王世充旦夕难保。这时，窦建德怕王世充覆灭后自己会成为唐军的目标，突然调十余万大军援救洛阳，李世民当机立断。围城打援，亲率精骑前去迎战，阻止王、窦两军会合。在汜水上李世民略施小计引诱窦建德出击，待窦军疲乏饥困时，李世民率先以优势的骑兵陷阵，窦建德仓促应战，全军溃败，本人生擒。王世充见大势已去，只好投降。这次一仗而克二敌的大胜来得似乎有些侥幸，但想到李世民临阵表现的大智大勇，胜利就并非偶然了。

最后对窦建德故将刘黑闥的战事，使李世民十分棘手。唐廷处死窦建德后，又严厉绳治他的旧部，激起刘黑闥为首的反抗，不到半年就完全恢复了窦建德故地，还打死了唐军骁将罗士信。李世民再度前去，采用决洛水灌敌的办法打败了刘黑闥。但两个月后，刘黑闥东山再起，仅仅四个月又尽复故地。

李渊改派太子建成为帅，用魏徵的建议，释放俘虏，以示宽大，瓦解了刘黑闥的军心，迅速平定了河北。惯于征战的李世民在这件事上受了挫折，他在太子的成功里看到魏徵的才能，认识到政策的威力，这无异使李世民又长起了一颗政治头脑，有益于成就他未来治国的大业。

从晋阳起兵到唐统一全国，李世民战功第一。开国后位兼将相，他的天策上将府和秦王府文学馆中人才济济，羽翼丰满，在众人鼓噪下他萌发了觊觎皇位之心。唐高祖却逐渐对他疏远，在太子建成联合齐王元吉倾轧秦王世民的争斗中，李渊偏袒建成，李世民危在旦夕，迫使他终于在武德九年（626年）发动玄武门事变，杀死兄弟，逼父退位，自己做了皇帝，号为太宗。他这时才虚岁二十九。

唐太宗李世民接手的唐政权是一个很景气的摊子。隋末以

来的丧乱中，山东、河北、河西等许多地方遭到大破坏，贞观初年又逢连年灾荒，关中饥民多卖子女以接衣食，社会经济凋弊残破，远未复苏。靠什么人来同他一起治理这样一个国家，是个严峻的问题。在这方面唐太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家胆略，他按任人唯贤的原则，不拘一格起用人才，从中央到地方拔用了一批精干的官吏，这是他搞“贞观之治”的秘诀所在。

唐太宗继位后，就着手改组宰相班子。唐高祖留下的一班人：裴寂、宇文士及、封德彝、杨恭仁、陈叔达、肖瑀，尽是姻亲宿旧前朝遗老，无不出身士族高门，大多迂腐保守，经改组，只一年功夫，除裴寂暂挂名司空外，其余都淘汰殆尽。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中自己提拔了二十三个宰相，出身寒门的超过三分之一，突破了西魏、周、隋至唐高祖时期朝政尽把持在士族门阀，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手中的格局。

贞观初的三年中，他起用的八个宰相，平均年龄五十岁，著名贤相房玄龄、杜如晦和魏徵当时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。八人中有三个还是曾有宿仇的政敌：

李靖是隋末的马邑郡丞，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密谋起兵被他识破，报告了隋廷，李渊占长安后抓住他要杀，李世民替他说情得免，召入幕府，成为唐朝的“南平吴会，北清沙漠，西定慕容”的一代名将，这时用为宰相。

王珪、魏徵原是太子宫臣，在他们兄弟之争中介入很深，曾劝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，玄武门事变时魏徵还以建成若用他计必无今日之祸的话顶撞李世民，唐太宗爱重人才不记前愆，委以国事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：“朕之授官，必择才行，若才行不至，纵朕至亲，亦不虚授，襄邑王神符（李世民堂叔）是也；若才有所适，虽怨仇而不弃，魏徵等是也。”（《旧唐书·长孙无忌传》）

再如韦挺，也是东宫旧属，与建成关系最好，也受到李世民重

用，官至黄门侍郎、御史大夫。韦挺以自己“非勋非旧而超处藩邸故门之上”，不敢就高位，太宗不许。这样做确曾引起一批秦府旧人不满，有人发牢骚说：“追随左右多少年，现在封官倒落在前宫、齐府人之后！”唐太宗告诉他们：“王者至公无私，故能服天下之心。朕与卿辈日所衣食，皆取诸民者也。故设官分职，以为民也，当择贤才而用之，岂以新旧为先后哉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92）

原东宫的李纲、窦轨、裴矩、郑善果、贺德仁、肖德言、欧阳询、唐临、唐宪、冯立、谢叔方、薛万彻，原齐王府的武士逸、袁朗、袁承序等，在贞观年间都继续任用，可见对建成、元吉党羽“一无所问”的政策是实际贯彻了的。这样容人的度量对延揽人才、稳定政局很有好处。著名的魏徵喜逢知己之主，竭尽才识，知无不言，以致君尧舜为己任，对“贞观之治”作出重要贡献，唐太宗高度评价说：“贞观之后，尽心于我，献纳忠谏，安国利民，犯颜正谏，匡朕之违者，唯魏徵而已。”（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）

唐太宗用的宰相中，魏徵、李勣、张亮、许敬宗参加过李密的瓦岗农民军，王珪、张亮、戴胄、马周小时家境贫苦，杜淹、温彦博、戴胄、刘洎、岑文本、褚遂良、张行成曾在王世充、肖铣、薛举等割据政权中供职，这些人在隋末动乱中都有丰富的阅历，对农民革命风暴的威力印象极深，做官兢以国事为忧，孜孜求治，多能直言极谏，时时以亡隋之鉴劝诫唐太宗，使他铭记“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侈，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”。他们为官也多清廉，魏徵、戴胄、温彦博居处宅宇弊陋，死时家无正寝，没有象样的地方停尸。贞观年间，君臣相互约束，不敢纵欲重敛百姓，人民能在比较安定的条件下致力生产，使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很快恢复发展。

贞观君臣在为国事分忧中各尽其职，他们肝胆相照，留下许

多感人的故事。李勣患病，唐太宗剪须烧灰为其合药，李勣“顿首见血，泣以恳谢”，唐太宗说：“吾为社稷计耳，不烦深谢。”一次食瓜味美，唐太宗想起早逝的杜如晦，“怆然悼之，遂辍食之半，遣使奠于灵座。”侯君集因卷入太子承乾谋反案，法不容赦，唐太宗为他说情，群臣不依，只好与他挥泪长诀，说：“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。”因念其功，指示不要涂去侯君集在凌烟阁的功臣象。温彦博和岑文本俩人是在职期间劳累过度而死的，唐太宗伤心懊恼，“恨不纵其闲逸，致天性灵”。岑文本拜中书令，“归家有忧色”，拒绝亲友庆贺，说“受吊不受贺”，是为“责重位高，所以忧惧”。果然上任不久便“精神顿竭，言辞举措，颇异平常”，不过一年，仅五十一岁便溘然长逝。魏徵为相，“深惧满盈”，房玄龄在职，“罄竭心力”，都频表辞位。可见那时的官是不好做的。李靖六十四岁时恳辞相职，唐太宗说：“联观自古已来，身居富贵，能知足者甚少。不问愚智，莫能自知，才虽不堪，强欲居职，纵有疾病，忧自勉强。公能识达大体，深足可嘉，联今非直成公雅志，欲以公为一代楷模。”（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）人不恋栈，这也是贞观官场中的一种良好风气。

关于官吏的退休，在唐代逐渐形成制度。为保持官吏队伍的干练，唐太宗还不时裁汰冗员。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房玄龄按他“官在得人，不在员多”的指示，一次将中央各官府的二千多官吏精简为六百四十三人。为革除地方上“民少吏多”之弊，还并省了许多州县。唐太宗特别重视地方吏治，“每夜恒思百姓间事，或至夜半不寐。惟恐都督、刺史堪养百姓以否。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，坐卧恒看，在官如有善事，亦具列于名下”，他强调“此辈实治乱所系，尤须得人”（《贞观政要·择官》）。唐代许多朝廷大员还不时被派到地方任职。官场中有进有出，能下能上，人材流动，大小职事官都不是终身职务。

唐太宗认为，君主的责任是“驱驾英材，推心待士”，并不求备职人，只是舍其短而用其长，但要求官吏必须奉公尽职，除了立程序，定制度，使各部门互相监督，还挟刑赏以制约臣下。他在位时完成了唐律的修订，那是我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刑法。他本人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，常常表彰敢于犯颜执法的官吏。贞观九年（634年），岷州都督高甑生犯诬告等罪，被判徙边，有人替他说情，“甑生旧秦府功臣，请宽其过”，唐太宗说：“虽是藩邸旧劳，诚不可忘，然理国守法，事须画一，今若赦之，使开侥幸之路……有功之人，皆须犯法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刑法》）还有一个卢祖尚，才兼文武，被选作交州都督，不肯赴任，受到斩决处分。老将尉迟敬德，战王世充时曾在重围中跃马刺单雄信落马，救李世民危难，玄武门事变中又射杀元吉论功第一，后来居功傲物，曾在宴席上争座次拳殴大臣，唐太宗以“韩、彭夷戮”的故事给与严厉警告，对他说：“国家纲纪，唯赏与罚，非分之恩，不可数得，勉自修饬，无貽后悔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94）尉迟敬德从此收敛，善保终身。

唐太宗经过多年苦心经营，培植起一批比较得力的官吏，他正是依靠这支队伍，实现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那时“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，大姓豪猾之伍，皆畏威屏迹，无敢侵渔细人。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圜墙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）贞观四年“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”，几至刑措。曾被理想化为古昔未有的盛世。他对数以百万计的来归少数民族也能待如一家，信用不疑，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爱戴，被尊为“华夷父母”、“天可汗”。使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唐太宗晚年的思想作风，各方面都有所倒退。功业垂成使他踌躇满志，终于禁不住物质享受的诱惑，步历代帝王的后尘，滥

（下转第22页）

百代英主 千古一帝

——论唐太宗的历史地位

袁英光 王界云

一、承上启下的时代

任何杰出人物的出现，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。要正确地评价唐太宗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功绩，就必须把握住唐太宗所处时代的特点，而这一特点，又必须放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。

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开始，到清代覆亡，绵延了近三千年，按其过程来讲，大致可以分成两大段。上段以魏晋南北朝为终点，是封建社会发生、发展的时期；下段以隋唐为起点，是封建社会繁荣、强盛，转而衰弱、消亡的时期。唐太宗所处的时代，恰在繁荣、强盛的起点上，可以说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。

在经济上，秦汉以来中国农业的重心在北方，产粮基地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以及江淮流域的部分地区。由于铁制农具的进步，南方的土地日益得到开发。尤其是西晋灭亡、永嘉东渡以后，大批北方世族地主裹挟着更为大量的北方农业人口，流向南方，带去了先进的农具和生产技术。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工具，与远比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（土壤、气候、水源等）相结合，很快使南方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起来，南方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比重日

益上升。隋统一以后所开凿的闻名中外的大运河，正是这一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。大运河是隋唐以来封建王朝的重要漕运通道。假如把大运河，再加上从其中点洛阳西通关中长安的漕路，很像一个横躺着的“人”字形。其头身部分在长安、洛阳（隋唐的政治中心）；其两腿，一伸向广褒的华北平原，一伸向富饶的东南地区。很显然，全国的农业基地大为扩大，经济基础更为雄厚，中国封建王朝这个东方巨大的根基更为牢固了。此外，还有四川盆地、西北的河西走廊、东北的辽东地区等等的开发，都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。

在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方面，这一时期也有着重要的发展。北魏贾思勰等《齐民要术》系统总结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，在北方地区得到普遍推广。三国时，曹操令韩暨推广以水排鼓风冶铁，为铁制农具的大量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尔后南北朝时冶铸业的新发明——灌钢法的出现，更对提高铁制工具的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南北朝时，使用牲畜拉犁耕田比秦汉时普遍了。而隋唐时广泛使用的曲辕犁更是一大进步。这种犁在小块土地上便于转弯回头，能控制犁地的深浅，便于深耕，使农耕作业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。此外，播种农具、除草农具和收割用的镰刀都比秦汉时进步。在农田灌溉工具方面更有长足的发展。东汉末毕岚创制的龙骨翻车，经曹魏马钧的改进，运转轻便，连小孩也能操作。至唐代，北方又出现了汲水的水车，长江流域则出现了形似纺车的筒车。

生产工具的进步，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。而生产力的进步，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，继而引起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变革。

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形态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。在封建社会的前期，士族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占据优势地位；在后期，普通地主（即非身份性地主）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户